



冯天瑜 黄长义 主编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书系——



冯天瑜 黄长义 主编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

中国传统现代转型创新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 / 冯天瑜, 黄长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161 - 3317 - 0

I. ①中 … II. ①冯… ②黄…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75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伊 岚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87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弁　　言

自明代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即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指向，如经济领域的从“农本”向“重商”转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破块启蒙”等，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有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又深受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发端于西欧并向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所促成的现代化浪潮，早在晚明已然惊涛拍岸。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鸦片、商品打破清王朝紧闭的国门，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国文化进入剧烈的转型阶段。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矛盾，古今中西缠结在一起。曾经颇有影响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或固守内因一隅，或偏执外力一端，都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将明中叶至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置于古今中西的历史坐标系中，从内因与外力相互作用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进行专题研讨。其各章作者分别如下：

第一章 代结语 冯天瑜

第二章 谢贵安

第三章 许苏民

第四章 张建民、周 荣

第五章 王雪华

第六章 张 岩

第七章 段 超

第八章、第十一章 黄长义

第九章、第十章 李少军

第十二章 孙秋云、陈宁英

第十三章 钟 年、方秋梅、柳素平

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是“横看”，还是“侧看”，都不能识庐山真面目。只有从总体的“旷观”出发，才能认识“庐山真面目”。东坡居士此论暗合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说：“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各种专门研究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把握和全面认识。本书各章虽为“横看”、“侧看”式的专题研究，但皆力求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总体出发，试图呈现出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庐山真面目”。

编 者

2009年3月

目 录

弁言	(1)
第一章 明清之际非君论思潮的近代性问题	
——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例	(1)
一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特征	(2)
二 《明夷待访录》的应运而生	(7)
三 《明夷待访录》的创识	(10)
四 《明夷待访录》政治理念的“近代性问题”	(24)
第二章 明末清初的“新民本”思想 (32)	
一 “新民本”思想的界定	(32)
二 新民本思想的来源	(36)
三 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41)
四 嫁接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砧木	(47)
第三章 浙西史学与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史学	
思想的变革	(50)
一 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51)

二 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54)
三 揭露历代“正史”之作伪	(57)
四 考辨史实真伪、订讹补阙的多重证据法.....	(60)
五 “引古筹今”的价值取向	(65)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公共领域”与社会保障	(70)
一 宗族组织与族内救助和保障	(75)
二 县以下基层组织及地方士绅的公益救助活动	(80)
三 会馆、公所的救助和保障活动.....	(88)
四 善会、善堂及其它民间会社的救助和保障活动.....	(93)
五 社会保障运行中的官民结合.....	(101)
第五章 从吏胥制度看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	(110)
一 清代吏胥舞弊之实情.....	(111)
二 清代吏胥制度的缺陷.....	(124)
三 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	(131)
第六章 包世臣与道光年间的盐、漕改革	(144)
一 包世臣与道光初年“海运南漕”改革.....	(144)
二 包世臣的盐法改革思想及其影响.....	(169)
第七章 陶澍改革的前近代性因素探析	(181)
一 陶澍在江南的大政改革.....	(181)
二 陶澍改革对近代经世大吏的影响.....	(188)
三 陶澍改革蕴含的新因素.....	(191)
四 陶澍改革的历史局限性.....	(197)

第八章 近代前夜中国士人的外域研究

——以嘉道之际的域外史地著作为观照点	(204)
一 西力东渐与中国周边局势的剧变	(204)
二 嘉道士人对“域外情事”的“探阅”	(211)
三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著作的近代意义	(221)

第九章 从中日比较看清中叶的经世实学 (232)

一 中日“经世实学”应对社会经济矛盾之比较	(233)
二 中日经世学者应对外来压力之比较	(260)

第十章 中日经世家应对近代转变之比较

——以魏源、冯桂芬和横井小楠为中心	(282)
一 对外观之比较	(285)
二 富国强兵主张之比较	(295)
三 政治政革主张之比较	(314)

第十一章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331)

一 经世思潮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转向	(332)
二 致用与务实：中西学实现对接的切入点	(341)
三 晚清经世实学与近代知识体系的演化	(348)

第十二章 晚清法律改革与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以《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篇为例	(356)
一 《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法系本质上的大突破	(356)
二 “亲属”编对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继承与扬弃	(363)
三 “继承”篇对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继承和扬弃	(370)
四 《大清民律草案》所体现的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	(375)

第十三章 中西日文化互动与学术近代化	(381)
一 “心理学”的输入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381)
二 “近代”、“近世”词义的演化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397)
三 “艺术”词义演变的文化内涵	(416)
代结语 探索近代文化轨迹的新创获	
——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读后	(428)

第一章

明清之际非君论思潮的近代性问题

——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例

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始撰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完稿于康熙元年（1662）的《明夷待访录》有“奇书”、“怪书”之称，近人更将其呼作“中国的《民约论》”。但也有人认为，与《孟子》中的民本思想相较，《明夷待访录》并无太多新意，不过是传统民本思想加上中古政治异端思想的结合，没有近代性可言，中国只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近代文化大举东渐以后，近代性民主理念才逐步展开。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包括政治理念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全然是外铄的，还是拥有一定的内在根源、由内外因素交会而成？

探讨这个切关宏旨的论题，以《明夷待访录》为具体解析对象是比较恰当的。其一，此书涉及政治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君权的来源、君主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君臣关系、纵向分权、权力的舆论监督、官僚制度、法制、兵役制、土地—财税制，等等。通过对《明夷待访录》关于这些问题所作阐发的剖析，可以看到十七世纪中叶藏之草野的激进政治理念在“传统性”与“近代性”之间徘徊过渡的真实状况。其二，《明夷待访录》成书之际，中国的政治理想领域还没有受到西方影响。虽然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西欧耶稣会士自明代万历以后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限于科技知识

和天主教（基督教的一支）教义，故清初成书的《明夷待访录》在政治理念上全然是本土文化产物，从其思想内涵、范畴体系到术语使用，都是中国化的。因此，这部政治哲学论著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近代性”因子的合适标本。

一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特征

探讨政治理念的“近代性”，首先要厘清与其对应并且为其渊源的“传统性”。

中国的政治领域存在一个沿袭久远的宗法—专制君主体制，这种“王权支配社会”的体制决定着中国政治理念的“传统性”。其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君权不受制衡。

在中国，君权被论证为来自上天的赐命，国君是“天之元子”，也即天帝的长子，又是万民的严父和导师，其意志言论即是法律，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其权力至高无上，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让。这就使中国的王权具有绝对性，与欧洲和日本存在明显差异。欧洲中世纪经历了封建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过渡，封建君主制并无强有力的王权，国王与贵族、领主分享权利。即使在专制君主制时期，王权亦受到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约，尤其是教会，在精神领域居于王权之上，教皇或主教向国王加冕的场景多次在欧洲各国上演，便生动地展示了欧洲王权的限定性。日本天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神道教”的教皇，实际政治权力掌握在所谓“关白”的权臣及幕府时代的征夷大将军手里，形成一种政教二元的统治结构。而中国自周秦以降便没有凌驾国家之上的宗教和教皇，以“天子”自命的王者兼掌政权与神权，故中国绝无教权限制王权的可能。而始于战国、完成于秦代的郡县制封建的变革，大大削弱了贵族和领主对皇权的制约力，使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已完成从封建君权向专制君权的过渡。而中国市民社会素不发达，历来缺乏市民政

治传统，直至明末方偶有市民抗议暴政的运动，但仍未构成对君权的有效制约。凡此种种，使得秦汉以迄明清两千年间的专制君权基本不受制约。某些士人试图以“王者师”的身份，通过说教和谏诤来限制王权，如汉代董仲舒提出以天抑君的“天谴说”构想^①，宋代理学家遵循孟子“格君心之非”^②的指示，作过教化帝王的努力，但这些尝试均不能形成对王权的体制性制衡，加之士大夫本身即为皇权的派生物（士人获得仕进全凭皇权的“选举”或“科举”），“忠君”成为士大夫的人生第一要义，故士大夫在君威面前直不起腰杆，无力实现对专制君主体制的限制，而只能充当这个体制的帮忙或帮闲。甚至博学如韩愈者，竟然申明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全然来自皇上的恩赐，所谓“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③。至于广大下层民众，则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是当他们失去生计、揭竿而起时，方以武力赢得某种政治发言权，但农民本身也是王权主义者，他们展开的武力抗争终究成为改朝换代，即所谓“易姓革命”的工具。而通过农民战争、异族入侵、宫廷政变等途径建立的新王朝，因文化生态未获更新，其专制君权的独断性不会有丝毫松动，从秦汉经唐宋直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专制君权的基本趋势是日渐强化，形成一种如司马迁所称的“天盖”式统治，“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④便是君权驾驭天下的写照。

第二，“治民”权术发达，而“民治”传统阙如。

中国的宗法—专制君主政体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是贡赋、劳役的提供者，民众安居乐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如果民不聊生，起而造反，即会导致王朝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29页。

^④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倾覆。故中国素有“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① 的说法。因此，何以“治民”，也即如何处理专制君主政体与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研讨的重点，“驭民术”成为儒、道、法诸家反复辩难的议题。法家极端尊君贱民，强调君主对臣民的绝对权威，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②。即使君昏主暴，臣民也唯有屈从，所谓“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③。道家一方面深切同情民众的苦难，谴责“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是“不仁”^④；另一方面又主张愚民，如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⑤不惜陷民于愚，以达到治平目的，这当然是站在王者一侧的制民权术。庄子则一面试图超脱王者政治，去“任自然”，一面又在琢磨如何“应帝王”，仍然未能摆脱王权的统驭。儒家充分意识到民众在君主统治中的基础地位，很早便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由此生发出“重民”、“恤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其辉煌论述如《左传》的“民，神之主也”，《穀梁传》的“民者君之本也”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⑦，孟子还认为，诛讨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并非弑君作乱^⑧。然而，即使孟子这样达于极至的民本主义者也是尊君论者，只要看看孟子与滕文公、梁惠王等君主的对话，便会发现这位老夫子苦口婆心的劝诫，是在为王者的长治久安作打算，他对暴君、暗主的猛烈抨击，衬托着对圣君、明主的期盼，表明他是深谋远虑的王权主义者，其学说称之

^① 见《荀子·王制》、《贞观政要》等。

^② 《韩非子·六反》。

^③ 《韩非子·有度》。

^④ 《老子》七四章。

^⑤ 《老子》六五章。

^⑥ 《尚书·无逸》。

^⑦ 《孟子·尽心下》。

^⑧ 《孟子·梁惠王下》。

“王道”，画龙点睛地揭示了这一精义。孟子虽然多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言论，曾发出“庖有肥肉，野有饿殍”的不平之鸣，千载之后被诗人杜甫衍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但孟子又认定民众只能被统治，不能自治，他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述，从肯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而言，是有价值的，但从取消民众参政权而言，则对中国传统政治“民治”缺位负有责任。总之，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几乎全然被王权主义所覆盖，民众不过是被治、被牧的对象，充其量受到同情和怜悯，如《左传》、《诗经》对“民人苦病”、“民人劳苦”的叹息，而罕见关于民众“自治”、“自主”的思想萌动。王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众也没有自主意识，只是期盼明君、清官的治理，而绝无“民治”的诉求。汉唐以来的政治异端，如东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唐代的《无能子》、宋元之际的《伯牙琴》等有着逸出君本位轨道的意向，但它们除复归“无所司牧，濛濛淳淳”^① 的原始无君社会，或向往子虚乌有的“桃花源”式的无差别境界外，别无积极的社会主张与王权主义相抗，民众如何在文明社会获得自身的基本权利，仍然不得要领。

第三，臣为君设，君尊臣卑。

介于君民之间的臣，或曰官吏阶层，在王权政治格局中，其功能是替君治民、代君行政，他们的权力、禄位来自君主的恩赐，其生杀予夺皆取决于君主的一动之念，因此，臣下只对君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韩愈将王权政治下的君、臣、民三者关系概括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② 代君治民的臣，又曰官，具有双重人格：在民众面前高高在上，官与君同义或近义；在君主面前则唯命是

^① 《无能子·圣过》。

^② 《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6页。

从，臣“象屈服之形”^①，君尊臣卑被视作天经地义，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讲究的“臣道”多论及此。所谓“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于地也”^②，又所谓“天地者，生之始也”，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③。学者如此论证，君主也如此颁旨，清康熙帝在《君臣一体论》中说：“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君臣悬隔既如天地，君臣关系即若主奴，臣子在君主面前以“犬马”、“爪牙”、“奴仆”自命。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也有“道高于君”的卓越命题，如荀子说“从道不从君”^④，晏婴主张“不死君难”，劝人不要替“为己死而为己亡”的昏暴之君殉葬^⑤。法家虽极端尊君，却也有法高于王的论说，并力倡“贵公”、“尚公”，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然而“道高于君”、“法高于王”的观点与王权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这里的“道”与“法”归根结底是王权的规律与法则，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⑥将道与君纳入一个整体。君主既然是道的体现者，臣子尊君也即是崇道。总之，无论从利害得失考虑，还是诉诸道义原则，君为臣纲都是不容置疑的，自秦汉以降一以贯之，诚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⑦

概言之，因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孕育，中国有着王权主义的强势传统，它笼罩着君民关系、君臣关系，规范着君、臣、民三者互动的轨迹，使法制、官制、军制、财制等大政无不受到其支配。而君权绝对化、民治缺位、尊君卑臣、人治（也即君治）

^① 许慎：《说文解字》。

^② 《管子·明法解》。

^③ 《荀子·王制》。

^④ 《荀子·臣道》。

^⑤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⑥ 《韩非子·主道》。

^⑦ 《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压倒法治、纵向分权无制度保障，便是中国政治理念传统性的突出表现，包括民本主义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皆在此规范之中。而《明夷待访录》却对这些“传统性”的某些基本命题提出大胆质疑，并加以系统而犀利的评析，若干论点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构成前近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亮点。

二 《明夷待访录》的应运而生

黄宗羲中年时代生活的明朝，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病端也愈益昭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子批评时政的党社活动因时而醒。与此同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有长足进步，又遭到矿监、税监一类虐政的摧残，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商业者与党社士人联系渐趋紧密，其共同愿望是舒缓专制的高压，这便招致朝廷对士人党社活动和市民抗争的残酷镇压。那时候，明清间的民族战争、遍及南北的农民战争愈演愈烈，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被统治者也无法照旧被统治。从精神领域而言，皇帝、朝廷、理学教条的权威发生动摇，朝野间的认识形成巨大反差，“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① 争取参与政权、非议君主专制的思想言行日渐张大，被士子中的“正人”视作楷模的顾宪诚等人“公是非于天下”的号召，冯琪等人对君主敛财的抨击，李三才制服内监淫威的业绩，杨涟对宦官干政危害的揭示，叶向高还实权于宰相的谠议，陈龙正、刘宗周分治不独治的倡言，都启迪着青年黄宗羲，这成为他日后创作《明夷待访录》的直接前导。

黄宗羲三十五岁时发生明清更革，这不仅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华夷剧变”，有着强劲的文化冲击力，士人们尤觉创巨痛深。黄氏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天崩地解”，

^① 《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

同时的王夫之则称之为“天崩地裂”，都是身历巨大历史性震撼之后的概括。时至清初，当明清更革战争的尘埃落定后，从烈火硝烟中退回书斋的士人，于痛定思痛间纷纷著述以总结历史教训。承袭着东林、复社议政传统，反映着早期市民挣脱君主专制的政治憧憬的黄宗羲，近取对明季弊政的切肤感受，又远纳三代以下的思想资源，并放眼来世，成就一部兼具现时性、超越性、前瞻性的政治哲学杰作。

是书原名《待访录》，黄氏生前及辞世后的一个世纪，此书仅有抄本流传于少数士子间。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始称该书名为《明夷待访录》，乾隆年间，慈溪郑性订定、其子郑大节刊刻是书，此即二老阁刻本，题名《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共二十一篇（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另有《明夷留书》五篇（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口史），今所见文质、封建二篇，经考证，亦为《待访录》篇目。^① 我们讨论《明夷待访录》，即以此二十三篇为对象。

黄宗羲将此书命名为“待访录”，含义在《题辞》中有所交待：

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爻！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

可见其志向高远，黄氏深知是著与强势的王权主义相对抗，不可能见容于当世，而他对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充满信心，寄望未来，故以

^① 参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附录：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